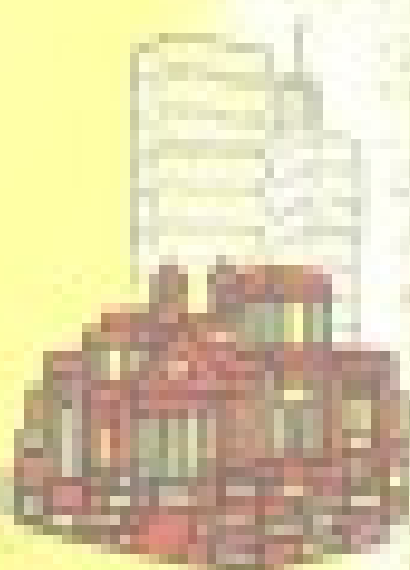


德意志近百年文化史



德意志近百年文化史



德意志近百年文化史

[德] 恩斯特·约翰 著
耶尔格·容克尔
史卓毅 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

Illustrierte
DEUTSCHE KULTURGESCHICHTE
Der Letzten hundert Jahre
1970 Nymphenburger Verlagshandlung
GmbH, München

德意志近百年文化史

[德]恩斯特·约翰 著

耶尔格·容克尔

史卓毅 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开本 11.75 印张 4 插页 200 千字

1986 年 5 月第 1 版 198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100

统一书号：11094·143 定价：2.10 元

译者的话

德意志文化的古典时期，曾出现过象康德、黑格尔、歌德、席勒、洪堡、贝多芬这样的文化伟人，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德国文化仍以其充沛的活力进行着历史性的创造，产生了象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现代物理学奠基人爱因斯坦这样的历史巨人，以及为数众多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艺术家、建筑家、工程师和工业家。他们犹如灿烂星空中颗颗明星放射着智慧的光芒。然而，近百年来又是世界历史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德国，这个思想家、科学家和文学艺术家的摇篮也曾经是文化的炼狱。这一切矛盾冲突的事物是怎样发展的？当代德国在文化上又有哪些成就？《德意志近百年文化史》（1860—1960）概括、全面地叙述了近一百年来德国的文化发展情况。本书涉及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史料较丰富，既列举了每一项科学文化上的成就，也展示出了其间的联系以及当时的政治与经济形势之间的关系，从而显示出文化是人类智慧的综合体现这一客观事实。本书包括正文、图片和年表三部分，其特点是明显的。

作者在原文前言中声称要“客观地展现历史的本来面

目”。但是由于他们世界观的局限性，对书中许多历史事件和人物仍不能做出完全正确的评价。因此，对于本书所提供的史料和观点，我们应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和看待。但是纵观全书，可以说本书仍不失为一本史料翔实的著作，对于我们从文化的角度去认识德国近百年在历史上的大起大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因此，我们组织翻译了这部书，以期对我国在文化史方面的研究有所裨益。

目前，我国正处在四化建设时期，我们不仅要搞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也要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包括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当然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要有中国的特点。但有批判地借鉴外国的经验对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文化建设却是必不可少的。德国是世界上工业建设和文化建设比较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了解他们的情况尤为必要，这是我们翻译这本文化史的又一目的。

本书译出后，西安外语学院梁家珍副教授审阅了全稿，提出不少宝贵意见，特此表示感谢。由于我们语言水平和知识水平有限，译文中错误和不妥之处一定不少，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八四年七月

目 录

译者的话

一、“德国人的祖国是什么?”	(1)
二、1871—1918年的帝国	(16)
创业者的时代：俾斯麦和他的反对派	(16)
哲学、艺术和科学	(29)
社会的进步和技术的发展	(41)
从假花到行业同盟会	(44)
福利：资产者与非资产者	(55)
第一次世界大战	(63)
三、1918—1933年的魏玛共和国	(78)
不受热爱的国家	(78)
“黄金般的”二十年代	(87)
四、自由的末日 1933—1945年	(101)
希特勒攫取政权	(101)
经济与战争	(107)
文化的末日	(109)
流亡与抵抗	(114)
五、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126)
战后时期——被分裂的德国	(127)
临时国家和基本法	(134)
调节——福利	(141)

重建文化	(145)
六、年表	(168)
1860——1960年年表	(169)
七、图片部分	(313)
八、索引	(314)

一、“德国人的祖国是什么？”

德国的古典时代以1830年歌德（Goethe）的逝世而告终。对文学、哲学和艺术是这样，对一般人的生活观念、对有教养的人的“世界观”来说也是这样。尽管如此，“受教育”依然是最值得追求的一种财富。关于教育和文化的关系，威廉·封·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曾这样写道：“文明是人类在他们的外部形态和与之相关的内心思想方面不断人化的过程。文化是用科学和艺术使社会现状完美所进行的补充。然而，在说到教育的时候，我们指的同时又是较高级的和更为内在的东西，即思维方式，它会把对全部精神和道义上追求的认识和感情和谐地倾注到感受和气质上。”

威廉·封·洪堡是普鲁士文化政策（1809—1810）的倡导者，曾进行过对其他国家来说也颇具典范作用的教育改革，创办了柏林大学。他只比他的朋友歌德多活了三年。莱辛（Lessing）于1781年，赫德尔（Herder）于1803年，康德（Kant）于1804年，席勒（Schiller）于1805年，维兰德（Wieland）于1813年先后逝世。他们都相信过理性和“真、善、美”的道德的力量。然而，德国人的不幸就在于

不能永远保持认识和感情之间的平衡。对他们来说，“寻找母亲的道路”——歌德是这样称呼对创造力的神秘支配权的渴望的——常常比具体地认识和理智地解决现实的问题重要得多。德国古典文化遗产、开明的大同世界思想、席勒的“千百万同胞，紧紧拥抱”的主张在整个十九世纪还继续发生着影响；但同时，德国人的“内心世界”——这个词就象它的同义词“情感”一样难于翻译——所形成的对生活的感情也发展起来了。

政治形势——解放战争以后民族的失望心理——助长了人们逃避世界，也就是逃避理性。在德国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流派它产生于十八世纪末——之中存在着反理性主义：继歌颂理性之后是歌颂心灵；人们逃避日常的需求，远离社会，甘心寂寞。

浪漫主义者不仅收集民歌和民间故事，他们自己也用民谣形式撰写诗歌和童话。阿希姆·封·阿尼姆（Achim von Arnim, 1781—1831）和克雷门斯·布林塔诺（Clemens Brentano, 1778—1842）共同搜集出版的民歌集《儿童的奇异的号角》（1804—1807）以及格林（Grimm）兄弟编写的《儿童与家庭童话集》（1812—1815）便可以证实德国人性格中具有“感情色彩”的一面。

理性和非理性倾向的交替出现对德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因为世界历史并非如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封·特赖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所称仅仅是政权的历史。但是，如果我们在这里纵观一下拿破仑战争和帝国建立（1871年）之间这一阶段的历史的时候，必然会谈到德国人的软弱无能：德国土地上昔日强大政权的最后残

余，“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被拿破仑（Napoleon）一世打得落花流水，于1806年8月6日土崩瓦解。就在这一天，查理大帝（Karl der Große）的第五十四代后裔、弗兰茨（Franz）二世皇帝（1792—1806年在位，后来作为弗兰茨一世在奥地利于1806—1835年执政）放弃了罗马王冕，只保留了不久以前才得到的奥地利国王的称号、尊严和权力。虽然维也纳会议（1814—1815）搞了个德意志同盟作替身，但是，与其说这个政治上的新创造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倒不如说它是那个从1663年延续到1806年的“从未间断”过、然而并无实权的累根斯堡帝国会议的继续。德意志同盟群龙无首，不可能实行统一的对外政策，并且，它也没有威廉·封·洪堡建议实行的统一的法律、统一的币制和度量单位。各国之间的关卡也还继续存在。这个同盟有三十九个成员国，其中有各自为政的德语国家和城市，以及在德国行使统治权的外国的君主，例如在汉诺威的大不列颠国王。另一方面，属于奥地利国家联盟的国家，例如匈牙利、威内斯、伦巴第，或者普鲁士王国的省份，例如东普鲁士、西普鲁士和波森都被排斥在同盟之外。那时虽然有由各个国家的军队组成的同盟军，但却没有民众的代表机构。

这个同盟完全是按照旧帝国的模式建立起来的，是中欧一些独立的德意志国家在放弃集中和行使政治权力情况下的一种联合。德意志同盟最高权力机构是位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联邦议会，奥托·封·俾斯麦（Otto von Bismark）从1851年到1858年在那里以特使的身分行使行政职权，他日后成了德意志帝国普鲁士议长，后来又成为总理。

普鲁士从1701年起成为王国。在五百年的历史发展过程

中，这个王国在霍亨索伦家族（Hohenzollern）的统治下逐渐成为除奥地利以外最强大的德意志国家。“国家”思想在解放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以后，在普鲁士比在其他德语国家扎的根要深；自然，普鲁士也为战胜拿破仑作出了最大的牺牲。所谓普鲁士的美德——“荣誉、忠诚、顺从和勇敢贯穿于从军官到年轻新兵的整个军队”，（封·俾斯麦语）使这个国家得以强大；然而，使它强大的还不仅仅是这些美德。1801年创办的柏林大学以其先进的组织形式成为十九世纪其他大学的楷模，不久，这里成了出类拔萃的学者的聚集中心，柏林市本身便成了浪漫诗歌和哲学的荟萃之地。除了威廉·封·洪堡和亚历山大·封·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 1769—1859）兄弟以外，有名的诗人和哲学家还有奥古斯特·威廉·施勒格尔（August Wilhelm Schlegel, 1767—1845）和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Friedrich Schlegel, 1772—1829）兄弟、路德维希·蒂克（Ludwig Tieck, 1773—1853）、海因里希·封·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 1777—1811）以及在“路德和维格纳尔酒店”和《谢拉皮翁兄弟》一书的几位作者会面聚餐的E·T·A·霍夫曼（E·T·A·Hoffmann, 1776—1822）。在当时德国首屈一指的大城市柏林，一些象拉合尔·瓦尔恩哈根（Rahel Varnhagen, 1771—1833）那样才智出众的女犹太人开办了文艺沙龙，出入那里的既有普鲁士的公子王孙，也有浪漫的文人学士。人们在那里对德意志同盟的政治意义也同样争论不休。威廉·封·洪堡认为，德意志同盟的整个存在是为了通过自身的重力保持平衡。人们相信，同盟能够保证柏林和维也纳之间的和平。这是欧洲

人的一种愿望，他们想使这个同盟继续保持旧帝国的超民族的特点。

浪漫主义思想方式不仅在德国对“民族国家”的思想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那些1815年以来在德国青年社里集结的大学青年尤其对这样一个德国民族国家感到欢欣鼓舞。他们把在解放战争时期吕措维尔志愿军团战士使用的黑—红—金三色作为自己旗子的颜色。他们要争取更多的自由和随自由而来的德国的统一。法乐尔斯乐本的奥古斯特·海因里希·霍夫曼（August Heinrich Hoffmann, 1798—1874）于1841年创作的《德国，德国高于一切》的歌曲表达了各阶层人民万众一心的愿望。不过，这首歌直到1922年才被宣布作为国歌；它的第三段现在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国歌。

可是，从世界大国到民族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个悬而未决的大问题，即未来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将由谁主沉浮？是普鲁士还是奥地利？

历史学家恩斯特·莫里兹·阿恩德（Ernst Moritz Arndt, 1769—1860）的著作早在解放战争时期就对人民和战士的政治观点发生过影响。他以如下的措词提出了一个著名的问题（1813年）：“什么是德国人的祖国？是人们的出生地，诸如萨克森—阿尔腾布格、萨克森—科布格—果达、萨克森—希尔德布尔格豪森、萨克森—麦宁根或是萨克森—魏玛—爱森那赫那样的小国（仅举三十九个国家中的几个为例），还是具有共同的语言和文化的整个较大的国家？难道萨克森—阿尔腾布格人或者萨克森—魏玛—爱森那赫人应该维护一种小国的意识吗？他们不是也早就赞同自法国革命以来大张旗鼓地宣扬的建立一个民族国家的思想吗？他们

同样认识到，只有一种德国语言和文学，只有唯一的一种精神上的奋发才能抵御法国的影响，正如只有众志成城才能共同战胜拿破仑一样。在跨越近在咫尺的邻国边界时还需继续交纳关税也是应该的吗？

什么是德国人的祖国？看来勿须置疑的是，整个德国是德国人的祖国；共同的历史和时代的现实需要都说明了这一点；远距离之间已经修建了铁路，开始了电报通讯。但是，这个新的、共同的祖国置于哪家政府的保护之下，在这个问题上还存在着很大的意见分歧。最初，奥地利提出了“大德意志方案”。但当时的维也纳不仅是大家愿意与之联结的德意志赫赫皇权的传统中心，同时它也是一个多民族帝国的首都，这个帝国囊括了许多非德意志的民族，诸如匈牙利人、捷克人和意大利人。这样一个多民族的集合体也会吸收“所有德意志部落”的新联合加入吗？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另一种就是以柏林和普鲁士为领导力量的“小德意志方案”，即建立一个新的德国人的祖国，它不包括奥地利境内的德意志民族。

俾斯麦坚韧不拔地推行他的对外政策，在进行了多次战争之后，1871年实现了德国的统一。对此，普鲁士单独地、心甘情愿地作了重要的准备。早在1818年它就着手为统一的经济创造前提。普鲁士从自由经济认识论的精神出发，颁布了一个新的关税法。该法令废除了散布在普鲁士领地各处的所有内部关税，免去了一切原料关税，大幅度降低了工业的保护关税，这就使普鲁士能够成为一个经济整体。这一自由政策很快就显出了成效：国家的经济力量得到了显著的增长。与此相应，个人的收入也大为增加。更加重要的是政治

上的影响：新经济政策的吸引力如此之大，以至连最小的德语国家都表示要遵照执行；他们看到了统一关税政策的优越性，于是首先放弃了与关卡有关的那一部分主权。1819年，施瓦尔茨堡—索恩德尔蒙森公爵（1794—1835年在位）不顾多方的诽谤谩骂实行了普鲁士关税制。他的最大心愿是修建一所剧院，现在普鲁士使它如愿以偿。如果说索恩德尔蒙森某公爵对艺术和维护体面的要求得到了满足的话，那么，与普鲁士建立关税同盟的其他国家也都得到了各自的好处。

1833/34年，大多数德语国家结成了以普鲁士为首的德国关税同盟。“如果说关税是各国政治分离的后果这句话是国家学说的真理的话，那么，这些国家结成的关税和商业同盟也必将导致政治体制上的联合这句话也同样是真理。”普鲁士财政部长弗里德里希·封·莫茨（Friedrich von Motz, 1775—1830年）曾这样预言。国民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利斯特（Friedrich List, 1789—1864年）和莫茨的思想相通。他虽然直到1841年才在他的主要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体制》里阐述他的思想，但早在1819年，他就为促进关税同盟成立了德国商业和手工业联盟。并非所有的德语国家都是关税同盟的成员国，但这一同盟却包括了巴伐利亚王国，这就等于作出了一项重要决定：把奥地利排除在外。因为没有巴伐利亚，就不可能成立一个奥地利自己的关税同盟。

德国关税同盟虽然对统一起了开路先锋的作用（正如现在的欧洲经济一体化为政治上的联合作准备一样），但是，“德国人的祖国是什么”这个本该作出决断的问题仍然悬而

未决。1867年俾斯麦曾试图把关税同盟扩大为关税议会；尽管在德意志战争（1866年）中由于奥地利的失败普鲁士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统治都已确定无疑，但单靠经济道路并不能达到目的，必须在政治方面采取行动，只有所有德语国家、即所有德国关税同盟成员国共同对敌作战，才会出现政治上的统一。

人民呢？统一的思想首先出现在渴望帝国统一的诗词和歌曲里。各个等级的人都有这种思想——持特权的地主贵族和普通平民百姓、农民和在工业上升的几十年中唯一经历了无产阶级化的工人。这些人之中，首当其冲的是射击和体操队。但是，真正的领导权还是掌握在学者、尤其是教授手中——象路德维希·乌兰德（Ludwig Uhland, 1787—1862）那样的诗人也在其中之列。1848年始发于巴黎的春季起义震撼了欧洲大国，起义未能解决民族和社会问题。起义失败以后，那些学者和教授号召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的保罗教堂召开德意志国民议会。这个代表大会从1848年一直开到1849年，它是德国民主自治的首次尝试。会议结束时，人们要求建立一个统一的、议会管理的帝国，但是，这个要求未能实现。会议以二百六十七票赞成、二百六十三票反对决定国家元首应该是“涂抹了一大滴民主油”的皇位继承人。这次的王冠授予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Friedrich Wilhelm IV., 1840—1861年在位），可是他拒绝接受，因为他认为这“是用背信弃义、违反誓约和背叛国家的污物和脏土捏成的王冠……它是可憎的1848年的产物”

“它就象腐尸烂肉一样臭不可闻，不能让他脏了霍亨索伦家族人的手”——他拒绝接受王冠，那是因为王冠出自于人民

之手，不是德国的诸侯王公所奉献给他的。

保罗教堂所遵循的政治信念虽然未能实现，但它对于人民的感情却具有深远的影响。自由主义的理想虽然受到压制，但不可能从人们的意识中清除。1848年的黑一红一金三色旗在1919年成了魏玛共和国的国旗，1949年成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国旗。

1848年，特里尔市的犹太人、新闻记者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在逗留巴黎和布鲁塞尔五年之后，又回到了德国。

他把带到巴黎和布鲁塞尔的哲学家黑格尔(Hegel, 1770—1831)的学说以一种新的形式，作为他的研究成果又带回了德国。他已经不满足于用哲学来解释世界，他要改变世界。在回国前的几个月，他和巴门的一位工厂主的儿子，那位早就了解并真挚感人地描写了英国工人阶级的令人愤慨的贫困状况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合写了那本真正要改变世界的、前所未有的政治小册子《共产党宣言》。

自1760年以来，人们就谈论“社会问题”，1832年在法国和英国几乎同时产生了一种理论：社会主义。它要求在劳动权力和安全权力平等的基础上，通过生产资料的公有实行社会和经济的改造。马克思和恩格斯阐明了“经济社会主义”的原意，这种社会主义必将导致资本主义的自取灭亡，进而使得无产阶级掌握生产资料成为可能和必然。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无产阶级是依附于统治阶级的、只能提供自己劳动力和劳动时间的最低等的和处处受压迫的阶